

第五章

酷兒離散：移居倫敦的香港男同志

Little Britain (港譯《小小小英國》)原是電台節目，後來發展成電視劇，自2003年首播以來一直大獲好評，成為英國演藝界一時佳話(作者按：節目已於2007年停播)。它是一齣英國電視處境喜劇，創作人及演員David Walliams與Matt Lucas在劇中以誇張、戲謔的方式模仿英國社會階層各式各樣的人。Daffyd Thomas是最矚目的角色之一，由已出櫃的男同志創作人兼演員Matt Lucas所飾演，他是一名鄉下的年輕男同志，住在威爾斯的一條小村莊，堅信自己是「村裏唯一的同志」。Daffyd演唱的《唯一一個基佬》，歌詞以「因為我係一個基佬……一個肥基佬！一個見得人嘅基佬！總之就係唯一一個基佬！」作結，為2007年*Comic Relief*的現場慈善騷掀起高潮。Matt Lucas這首歌的歌詞誇張、大膽、直接，讓我歎為觀止。對我來說，他不但精彩和有趣地演繹了Daffyd這個男同志角色，更為自己的個人生活作出公開宣言，在舞台上高呼：「我係一個基佬，一個肥基佬！」

當我穿越各大洲來到英國時，不少思緒在腦中閃過。我想到我在倫敦的受訪者。他們在1980和1990年代來到英國，現在已是當地居民。是什麼因素使他們離鄉別井？作為華人男性，他們在前宗

主國的土地上經歷了什麼？他們在英國屬於少數族群，而這又跟他們的情慾有甚麼關係？他們是否可以引以為傲地說：「我係一個基佬，一個英籍華裔基佬」？英籍華裔男同志又是否「見得人嘅基佬」？他們的家在何處？

如果公民權的形成過程有着「自我製造」與「被製造」的雙重元素，而這個過程又離不開民族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權力網絡 (Ong 1996: 737; Foucault 1982, 1988, 1991) 的話，那麼居於英國的華人是如何發展出一種「新族群身份」(new ethnicity) (Hall 1996c)¹呢？他們變成了(或被變成)甚麼樣的公民？如果英國的同志只是「局部的」公民，無法完全擁有各種權利，那麼我訪問的華人移民(在英國份屬少數族裔)男同志，在種族與情慾等因素交織下，會否在英國社會以至男同志社群裏面對更多問題呢？

本章將探討1980和1990年代移民到英國的三種類型的香港男同志。他們在當地屬於少數族裔，亦同時是性少數，往往需要承受各種壓力。這些壓力來自白人和異性戀社會，以及強調性愛的男同志社群本身。身為英籍的華人移民男同志，雖然在同志圈的種族階級中被安排了「金童」(golden boy)的位置，即活在非常普遍的刻板形象之下，但與此同時，他們努力尋找新的方式去實踐男同志公民權的概念，並在錯綜複雜的權力網絡內按着各種矛盾的劇本演出自我。

身為英國少數族裔的華人

有別於北美和澳洲，英國的華人人口相對較少。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，居英華人佔總人口(63,182,178人)的0.7%(433,150

人)，在非白人人人口(8,171,819人)中則佔5.3%(作者按：上述數據在此中譯本中更新，英文原版的數據則止於2001年，www.statistics.gov.uk，最新資料取於2017年2月28日)。由於英國政府謹慎地處理移民政策，這個規模相對較小的族群常被學術研究所忽略，不論是廣受稱譽的英國種族與族群研究，抑或是海外華人研究。前者聚焦在英國最多的兩個非白人人人口，即南亞裔英國人，以及黑人或非裔英國人；²後者則主要聚焦於北美和澳洲華僑，以及當地出生的新世代華人的經驗。³

文獻指出，⁴歷史上曾出現幾波華人移居英國的潮流，當中有重要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因素，以及政府的移民政策和措施的影響。紀錄顯示，最早來到的華人是一些貧困、低教育程度的年輕船員。他們主要來自中國廣州南部，在18、19世紀因為英國與亞洲的海上貿易增加(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)而來到英國。這些中國船員很少受到關注，早期人們對他們的印象是「中國佬」(Chinaman)，以充滿種族歧視的用語「黃禍」來描繪他們，形象不是吸鴉片的人就是惡貫滿盈的罪犯，一如Sax Rohmer暢銷小說和短篇故事系列裏的「傅滿洲」(可參見Parker 1998: 67-74; Baker 1994: 291-293)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，英國的華人社群主要由船員及其妻子組成，但人數漸減，散居在細小的港口城市，維持一種由洗衣店、餐館和雜貨舖構成的圈圍式經濟(enclave economy)。他們無意尋找可以長期逗留的安身立命之所，英國人亦沒有善待他們。他們的生命故事，只留下零星的軌跡可供追尋。

1950及1960年代初期，英國華人人口顯著增長，這些人佔了今天英國華人的大多數。相關文獻指出了三大因素：(一)1914年及1948年的《英國國籍法》賦予英聯邦公民前往英國的自由；(二)

戰後英國民眾對異國食品的需求湧現，包括希臘、印度、意大利和中國，主打族群特色的餐飲貿易隨之興起；(三)中國大陸政局動蕩，香港出現難民潮，影響了新界地區村民的生活，並為就業市場帶來激烈競爭 (Skeldon 1994a: 25–26; Baker 1994: 293–303; Parker 1998: 74–78)。

然而，這種遷移模式在1960年代初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。1962年英國國會訂立了《英聯邦移民法》，加上隨後幾年的一些新法令，不僅限制了移居英國的英聯邦勞工人數，同時透過「就業券」制度把他們吸納到餐飲業工作。文獻遂指出第二波移民潮的特色是連鎖性遷移 (chain migration)，以及被集中在餐飲業的勞動力。到1960年代末期，英國華人主要由幾個族群組成：服務於餐飲業的新移民勞動人口，大部分來自香港新界地區，說客家話；來自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前英國殖民地的學生及專業人士；來自越南的難民；其餘人口包括早期的船員、洗衣店老闆及其後代 (Parker 1998: 76–78; Baker 1994: 303–305)。由於華人高度集中於餐飲業，因此直至今日英國社會對華人的主要印象仍然是「餐飲業者」 (restaurateur)。

Skeldon (1994a) 指出，自1960年代以來，加拿大、美國、澳洲和紐西蘭已漸漸取代英國，成為香港選擇移民的主要國家，一方面是因為英國對移民的限制愈來愈多，而餐飲業對來自香港的勞工需求亦減少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其他國家放寬了針對非歐洲移民的限制。⁵

為回應香港人對1997年主權移交的焦慮，英國政府提供了居英權計劃，但配額相當有限。回歸前不少人覺得香港前途充滿未知之數，此計劃旨在緩和這份不安，同時堵截大量移民湧入英國。然而，計劃截止前申請人數出乎意料的少，顯示香港人移民的目的地

主要為北美及澳洲，而非歐洲 (Skeldon 1994a: 35–37)。

當代種族論述常將英國華人視為「向上流動」的成功人士 (Cheng 1996)，並歸因於其「節儉、勤奮、孝順、重視關係等傳統美德」 (Lee et al 2002: 608)。他們得到親屬網絡及人際關係的支撐，被視為「同化程度最低」的少數族群，不甘願改變生活方式以迎合英國社會的期望 (Tam 1998)。⁶但與此同時，當代英國華人又跟北美華人有相似的地方，給人一種「模範少數族群」的印象 (Kibria 2002: Ch. 5)。Ong (1998: 151) 指出：「當代社會對亞洲少數族群的觀點，建基於東方式的順從、勤勉、自給自足、富生產力等定型，認為他們理想地發揮了良好公民的人力資本，有別於依賴福利制度的人。」

Rassool (1999: 23–24) 指出，英國的種族論述歷來都將移民和外來者劃上等號，視之為一個問題，必須透過移民管制和社會福利計劃的介入加以處理。Benton and Gomez (2008: Ch. 6) 記錄了居英華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。例如早期英國商船老闆就對華人船員進行嚴重剝削，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默許和支持。英國人認為他們對勞工階級的白人構成威脅，造成經濟競爭，而媒體亦將他們塑造為對國家民族有威脅的少數族群，並且與毒品、黑幫及暴力問題掛鉤，從而製造道德恐慌，針對種族的攻擊和暴力事件因此時有發生。但一般而言，戰後華人比早期的僑民承受較少的種族主義式欺凌與歧視。如 Benson and Gomez (2008: 19) 所言，這是因為華人移民主要為自僱人士，集中在小型企業，亦可說是一種策略，用以克服語言障礙、種族歧視和其他不利的處境。這個策略繼而使他們難以投入勞動市場，與本土英國人競爭。而這種強調自給自足的傾向，亦恰好配合了英國政府 (尤其是戴卓爾夫人年代) 為疏導種族主義所施行的小型企業推廣策略。

雖然華人學生在英國教育制度下成績非凡，華人男性亦成功在餐飲業以外的職場攀上較高職位，得到「模範少數族群」的地位和成就，但1990年代的研究仍顯示，高學歷華人依舊受到各種歧視：他們必須比白人同事擁有更好的資歷，才能獲得相同的職位，而且薪酬較低，晉升高層管理職位相對困難（即所謂的「玻璃天花板」效應），失業機會亦較大（Benton and Gomez 2008: 314–318; Pang 1996, 1999）。

如今，華人在英國社會仍然缺乏代表性。英國的政治體系裏也沒有任何一位英籍華人的國會議員（Khong 2008）。大眾媒體裏幾乎看不到華人身影，形象刻板依舊，離不開功夫高手、黑幫分子、唐人街餐館侍應，或勤奮工作的專業人士。

身為「局部的」公民的英國同志

長久以來，同志在英國社會如同「局部的」公民，在權利方面受到不公平對待。有關同志如何對抗歧視，已有詳盡的文獻記載（如Plummer 1999; Weeks 1990; Healey and Mason 1994）。抗爭例子多不勝數，包括爭取廢除禁止於公開及私人場所進行同性性行為的法律；挑戰生活各個領域裏的歧視與差別對待，例如教育體制、職場以至家庭；抨擊異性戀霸權社會的核心價值，如爭取同性婚姻和同志養育及收養子女的權利。同志政治採取集體示威、宣傳小組、靜坐和遊說等行動策略，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富有凝聚力、能見度高、具政治意識和樂於宣示情慾的社群。

在法律改革方面，英國的主要發展包括：1967年《性罪行條例》

的修訂，將兩個21歲或以上的男性在私人場所進行的性行為非刑事化，並根據1957年「沃芬敦報告」(Wolfenden Report)的精神所起草；2000年《性罪行條例修訂案》使雙方同意的異性戀和同性戀性行為的合法年齡劃一；2003年廢除《1988年地方政府法》第28節，不再禁止人們將同性戀視為等同一般家庭的關係 (pre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)；2004年的《民事伴侶法》允許同性伴侶取得官方認可的伴侶地位，享有異性戀已婚伴侶大部分的權利 (www.stonewall.org.uk，資料取於2008年11月26日)。⁷ (作者按：英國於2014年正式通過同性婚姻。)

同志運動在以下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(如 www.stonewall.org.uk，資料取於2008年11月26日互聯網上取得；Plummer 1999, 2003: 78-80)：(一) 各種政治團體相繼成立，爭取法律與社會改革，例如1970年代的Gay Liberation Front、1980年代晚期開始活躍的Stonewall和Outrage，而公開出櫃的國會議員亦愈來愈多；(二) 社福機構同時冒起，提供個人輔導、電話熱線，以及愛滋病和濫藥支援服務；(三) 興趣小組多不勝數，橫跨不同年齡、種族、運動嗜好、性癖好等；(四) 大眾媒體開始呈現更多元化的同志形象，例如電視劇 *Out on Tuesday* (1989-1990), *Gaytime TV* (1995-1999), *Queer as Folk* (1999-2000), *Clapham Junction* (2007)；電影 *Victim* (1961), *My Beautiful Laundrette* (1986), *Beautiful Thing* (1996)；同志刊物 *Gay Times*, *Attitude*, *QX*, *Pink Paper*等；(五) 同志市場 (亦稱「粉紅經濟」) 蓬勃發展，咖啡館、酒吧、的士高、桑拿、時裝店和美容院成行成市，集會和遊行等活動亦得到大企業贊助；(六) 不少大學開設同志研究及出版相關刊物，逐漸打破Escoffier (1998: Ch. 4) 口中的「象牙塔裏的衣櫃」。

雖然這一切成功地開拓了酷兒空間，我們仍須保持警惕。

Klesse (2007: Ch. 1) 指出，英國法律將酷兒的身份、情慾和關係逐出公共領域，藉此建構以異性戀價值為中心的公民權（參見Cooper 1995, 2002: Ch. 6; Stychin 2003: Ch. 2）。⁸儘管1967年《性罪行條例》的修訂將兩個男人在私人場所的性行為非刑事化，但同時也將同性戀者二分為「正派」和「敗類」：前者只會和其他年滿21歲的成年男子在「私底下」發展關係；後者只屬少數，他們沉溺於公眾地方發生性行為，或與未成年伴侶發生性行為，故理應受到管控。⁹如Bell and Binnie (2000: 53–61)與Stychin (2003: Ch. 2)所言，雖然新工黨政府認可了同性伴侶關係，並通過法律改革，但實際上仍然擁護以異性戀為中心的家庭價值。（作者按：英國現時由保守黨執政。）

同志社群跟倫敦的整體社會一樣，以白人、中產和英國人為主。雖然少數族群缺乏代表性，但倫敦無疑是一個多種族與多元文化的社會。至於商業化的男同志空間，可以是身份認同、浪漫愛情、社交和情慾互動的場域，但同時也可以是「建基於性商品化的市場經濟」（Keogh et al. 2004a: 12）。普遍而言，社群對於不同種族的情慾想像十分刻板，例如黑人和愛爾蘭人（Keogh et al. 2004b），¹⁰以及亞洲人和中國人。

中產階級、受過良好教育、有着陽剛身體的成年英國男性，被建構為具有支配地位的男同志公民（見第三章註釋11）。在帶有種族主義色彩和刻板的情慾想像下，加勒比裔黑人男性和華人男性似乎代表着兩個極端：前者被視為「極度男性化」及「性能力超強」（主動、霸氣、強壯和魁梧），後者則是「極度女性化」及「性能力弱」（被動、友善、溫馴和嬌小）。正如Fung (1996)對北美地區的觀察：「白人落在正中位置，擁有完美的平衡，不需要被分析，也不用被檢視」（179；亦可參見Fung 1995）。